

有些时候,我们阅读小说可能只是因为好奇,好奇别人的生活,好奇别人眼中的世界。大约是2003年前后,刘星显有篇叫做《肉》的小说就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大明镇,一个不知姓氏的二丑,与一本从大板床下拖出的《康熙字典》和“杀春猪”鬼使神差地发生了关系。然而,当胡大壮、三彪、孟老太等一千人聚齐,死的不光有猪,还有人。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种超乎日常生活怪异离奇的世界便一直吸引着刘星显不断探索与尝试,直到今天小说集《异人录》的出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察觉其中某种奇妙的拧巴,当刘星显好奇于一个完全远离他的世界是如何运转并伺机讲述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可能是一个致力于理论法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是怎样让文学创作占据了他的生活。也许他上一本小说集《夜夜声声》中的那句话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半献给虚妄的痛楚,一半献给黑夜的孤独。”

《异人录》中的小说以颜色为序,“蓝、褐、紫、赤、黄、黑、橙、粉……”的排列似乎有些门道,但细想可能会落入陷阱,毕竟我们很难去推断“异人”的逻辑。但它多少与小说的调子有关,正如《异人录》所呈现的世界,五花八门,让人似曾相识又一知半解。《异人录》中的小说不同于之前的《肉》或《夜夜声声》中的其他作品,这里没有一个未知的充满神秘感和江湖气的大明镇,一切都来源于最普遍、最日常的城市生活。可是,《异人录》所要做的,正是想尽办法把“异人”、“异事”注入到最平淡、最无趣的生活之中。

《阿豆》开始于一场并不见成效的传讯。因为只是配合调查,欧阳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严肃,可能相比回答有关老朋友是否有犯罪嫌疑的问题,他对一男一女两名警察的关系更感兴趣,他从对方眉宇间的青涩发现二者关系暧昧,又故意摆出一副滑稽和无奈的姿态引来女警会心微笑,他猜想着这两名年轻的警察在漫长的青少年时代一定遭受无数课业的摧残,被迫死记标准答案,活在一群弄墨文人的阴影里,“如今脱身而出,恰巧逮到一个作家,那感觉肯定与捕获个扒手不同”。两名警察试试探探想把欧阳的回答引向老朋友文阑的精神状况,但对于他是否因为离婚而精神崩溃,以至把一条狗当成自己的情人,当这条狗被小孩踢打而爆发出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欧阳对此打起了“太极”。小说仿佛在进行着一场心理上的争夺战,无论对于警察还是欧阳,每一步都是进退退,而对这种微妙心理颇具分寸感的描写又与一个看上去十分荒唐的案件裹缠在一起。可是,文阑一篇名为《阿豆》的手稿的出现又让事情再次陷入迷局。“阿豆是我豢养的一个女子。这么说也许有点不敬,也可能遭人误解,但的确如此。”小说由此转入了“异人”的世界:阿豆如何被从水中救起,怎样在雪中与“我”热烈地拥抱,她的内心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不安与恐惧,读者又是如何理解文阑的创作……手稿并非要破解文阑的迷案,相反,这个案件对

在庸常的生活中潜伏下来

□ 李振

于欧阳来说越来越不重要,“或许某天他真的能见到传说中的阿豆,或许阿豆只是一条狗,抑或文阑真的疯了”。欧阳永远不会成为侦探,不会揭开小说的谜底,他所能做的就是完成两则故事的镶嵌,为“异人”的存活撑开一个空间,如同打开阴阳两界的的大门,没人知道将会遇见什么,却会满怀心事地揣摩一个隐秘的世界并将其视为记忆的珍宝。

在《如厕》里,欲望与生死成了被反复揣摩的问题。在一次充满诱惑与不安的旅途中,小说试图揭开被不断粉饰的生活的另一面。路遇搭车



到最后的5公里,他还在为自己错失了增进感情的可能而沮丧懊恼,但当女子真的下车离开,“周身紧绷的肌肉骤然松弛下来,贴在脸上僵硬的笑容终于可以撤掉”,他把车开得飞快,然后按部就班地遵照加油站小工所说的破解方法逐一执行——他知道这么做的确很蠢,但又陷在恐惧中不能自拔。小说于此如稀泥流淌,在胶着紧涩之中让欲望与恐惧或欲望与生死进行着较量。好不容易熬到目的地,杀猪下酒的热闹场景几乎让穆梓魂飞魄散,因为他分明看到被赤条条赶来的正是路上的女子。他认定自己出现了幻觉,旅途劳顿,对搭车女子的幻想,酒精的麻醉,好像共同编织出一幅幻象,然而那投射过来的乞求的、绝望的、哀怨的、恨恨的眼神又为何那么清晰?或者人猪有别,生死无差?《轮回》同样讲的是生死,谭氏在她最后的5天里淡定又疯狂。她像往常一样对着空荡荡的房间狠狠地咳嗽,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些让她心寒的子女将会如何迅速地分割遗产,她甚至还依照惯例去搅动酱缸,只为气气当年的老对头。然而到了夜里,“她就换了一副面孔,用谩骂来哀号,用诅咒来乞讨,用狂笑来痛哭……理直气壮地对着命运的神激烈地申辩”。谭氏最后的时间可能与穆梓的那14个小时有着某种相通之处,正如后者明知那么做很蠢却依然为之,即便经历两次生死的谭氏又如何能真的克服对死亡或者更具体的腐朽、干枯、烟消云散和不可轮回的恐惧?相对于世间的幸存者,谭氏无疑是他们眼中的“异人”,而这些常人却最终难逃化作“异人”的命运。抑或面对生死,本就没有什么是“异人”?

《火机》将最狠毒的故事隐藏在大学宿舍守着电饭锅思考一个打火机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最终会出现在哪个裤兜里的无聊时间里;《献祭》中

青年学生为了前程决心走向“保研路”,却未料想已有人捷足先登;《回旋》在日常琐碎烦冗的叙事中不经意地施放出一种阴晦的意外;《蛾子》揭开了一对夫妻从未约定甚至双方都未曾觉察的默契“骗局”;《簪子》则是以当下的生活经验重新讲述了清代笔记小说《夜谭随录》中的《护军女》……《异人录》注定不能成为当前所谓正统文学写作的“局内人”,大概这也便是“异人”难以逃脱的命数。但它却不断显示着作者在文学想象的世界中面对现实生活的“不安分”,证明着作者正在进行的某种别样的写作方式的尝试——它用当下的生活与现代的叙述盘活传统志怪的奇异世界和丰富资源,又以“异人”、“异事”来重现与解构我们对于所谓现实的理解和想象。《异人录》因此展现出更加广阔写作视野,又因其少有禁忌而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发展你合法的怪癖吧!”在这个充满矛盾又趋于同质化的时代中,人们现实生活中欲望与灵魂所经受的扭曲、挤压与妥协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施放和补偿?刘星显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异人”的世界会是个令人不安又不失惊奇的去处。就像我们虽然无法真正揣测理论法学与志怪小说的神秘关联,难以丈量“异人”与自我的距离,却能够在《异人录》中发现一种别样的阅读乐趣,发现一个写作者为自己和读者所铺设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叙事游戏,发现一个不安分的人于庸常的生活潜伏下来,然后在想象的世界里呼风唤雨或兴风作浪。



作为生命的“减法”

□ 张涛

伴而生的。

格致最初距离读书的学校还不到30米,后来逐渐到750米,4公里。距离的延伸,导致的是宠爱的失去,或者准确地说是父亲权力的光环照不到“我”前行的路,“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于是,我向前行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格致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以及对“生活政治”或“权力”的敏感。有很多人在谈论格致的散文时,时常提及格致在散文中体现的那种“冷”或者格致的“勇敢”。格致在她的散文中,确实是有如此的体现。但或许这并不是格致散文的一个重要本色。我以为,在格致的散文创作中,她对历史、生活、政治、权力,均很敏感,也有着一种省思和批判的态度。但这种省思与批判是“有限度”的,当然,这并不是格致个人的限度,而是一种人性的限度。

《利刃的语言》是格致散文创作中的名篇。讲述的是“我”到一个西瓜摊买西瓜,卖瓜人“叫”(切开一块验优劣)开西瓜后,我发现西瓜不好。而“卖瓜人一手托着瓜,一手握着西瓜刀,不好,哪不好?并且直视我。”我终于在这利刃面前害怕了。有很多评论据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谈格致作为一位女性是如何面对“男权”的。但在我看来,格致的思考并没有局限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她发现“刀是有语言的……它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比如青菜,比如绢布,比如女人。它说它不大喜欢石头、金属、男人等一切不容易切割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格致在此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权力”或者是“力量”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或者反抗也是有局限的。“我”最后还是识时务地买了两种东西——肉和西瓜。我们看到了“我”或者格致在她的散文中对“刀”的妥协。要是放在此前,我也会以为格致的散文是“软弱”的,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也没有表现出不顾一切、血拼到底的

反抗力量,连实现一个“诗性正义”的勇气也没有。但我现在不大认为格致是软弱的了。因为格致已经看得很透彻了,刀就是“力量”,刀说的就是“真理”。现实就是如此的“坚硬”,如此的“赤裸裸”。我们为什么还祈求那个虚幻的“诗性正义”呢?这虚幻的正义又如何在生活中给予我们力量。



正如格致在《减法》中呈现的那样,“减法”除了是一种计算意义上的运算外,还是一种“妥协”与“成长”。在现实中,我们目睹着他人的“减法”,也切身体味着自我的“减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的创作成为一股热潮。在格致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她对“历史”的关注,但她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大历史散文”的外在“形式”,而是直接抵达历史中个体生命的隐痛,以及历史自身的“伤口”。格致在《减法》中,不断回忆她周围的同学逐渐“减少”的过程。这里面有

的因为是智力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偷了老师的5块钱,在另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了尿,当然这些学生也为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被“示众”(在那个年代里,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对待那些有“问题”的人)并且“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

过这种“家族记忆”去打捞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如《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篇章。这种写作方式,在近年也算是散文或者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这类散文大多是以“私人化”的方式,来重新回望或阐释过往的记忆与历史。如《乌喇街商铺见取图》是以已经去世的母亲托梦的方式,来告诉“我”当年在乌喇街的老房子漏了,由此又讲到了“我的地主姥爷,以及民国那个时代。笔者曾经去过两次乌喇街,对于格致在《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历史或现实,有一些了解与亲见。虽然两次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但对格致在文中流露出的一些情绪,多少还是有些“感同身受”的。格致在这一类散文中表达的都是一种“怀旧”的情绪,当然在这“怀旧”的情绪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情感与现实的交织。格致在此是对一种边缘文化的凭吊与打捞。这些

边缘文化其实也是历史在其自身发展中做的一种“减法”,有些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乃至消亡的过程。

格致在这些与家族记忆、民族文化相关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很从容,也柔和了一些;讲述的故事很小,但有很强的历史关怀。这也是近年来历史散文创作中的一个明显倾向。所以,格致的这些创作,在文学的意义上,不如早前的创作那么好,那么有震撼力,那么有独特性。或许对于格致来说,这种从容、柔和并不是她创作的最佳表达方式,反而倒是那种犀利、冷酷是她创作的最适合同时也是最有独特性的表达方式。